



政治生活的 系统分析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美】戴维·伊斯顿 著 王浦劬 译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美】戴维·伊斯顿 著 王浦劬 译



华夏出版社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伊斯顿著;王浦劬等译.2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ISBN 7-5080-1643-2

I.政… II.①伊… ②王… III.政治学-研究 IV.DD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386 号

责任编辑 褚朔维

装帧设计 陶建胜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兴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8.75印张 430千字

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80-1143-2/D·223

定价:27.10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总 序

社会的发展,科学的昌明,思想的进步,永远需要某种有着丰富养料的环境。这种环境在所有有理智而又不乏灵气的人们心中,首先便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累积。近代中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降,许多学者为此倾力于西方典籍的传译,成绩斐然,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学者研究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新作迭出,这些新作对于当今中国广大读者,显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翻译出版现代西方思想名著,尚有许多工作可做。

如同读者所知,现代西方思想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显示出深层转变而日益走向综合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一令人捉摸难定的趋势,又隐约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学理的传承相继。“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的创设,恰好立意在接续先贤传译西方思想经典的伟业,为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理解和借鉴现代西方思想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或食粮,以期看到我们思想界、学术界在荆棘与鲜花并

见的求索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选译的著作，在力求反映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的独创性与思维深邃性的同时，尤其注重思想的全面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现代西方的思想佳作，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广义人文学科，无论是既已成为主流学派的名家大作，还是依然在支流思潮中涌动强劲的新秀新作，无论是以思想观念的独创性而特立独行于人类思想史的“义理之学”，还是将研究方法的更新变换纳入漫漫思想长河的“考据之学”，凡此种种无不在搜罗之列。我们的译介，尤其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以研究探索性翻译为译事所追求的目标；“勿以译为讹为托言”，应当成为我们以及我们的译者们的座右铭。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既是一项恢宏繁复的工作，也是一份至为艰巨且任重道远的事业。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在此项事业发展的旅途上，我们首先应当由衷地感谢那些关注这一文库的读者们。同样，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养料或食粮的思想家们以及把这些材料传译过来的人们。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我们的期盼中将会扶助并参与到此项事业中的人们。

谨此为序。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主要趋势回望*

戴维·伊斯顿

能够就《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以中文出版事宜略作述介,令我不胜荣幸。这些年来,我几度有幸向中国学界同仁谈及本书的内容,这说明中国学人对我所述及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兴味,亦表明了他们思想的大度敞放。对于中国学者在政治探索过程中就系统思想的内涵作进一步切磋来说,这都是些祥瑞之兆。

自本书首次面世以来,荏苒二十载光阴已逝。这二十年来,恍若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政治科学历经沧桑,遭际了若许意味深长的浮泛变化。要想明了系统分析在政治科学中的现下地位,自应体味斟

• 此题为中译本编者于此代拟。

虑这些变化。近几年来,本书屡屡被译成各种文字,这就使我有可能就着本书问世以来政治学研究的沧桑变化,来掂量衡度系统分析在政治科学中的当前地位。我想,经常以同一种语言,使我的中国新读者们知晓我在其他著述中所作的种种思考,那委实是再合宜不过了,可是碍于语言的樊篱,这一想法恐难轻易实现。

在本书首次出版时,整个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中的主要趋势是致力于基础性研究。以往的研究遭到了抨击,因为它们缺乏科学的精确性,过分执著于研究即时的社会问题而舍弃了基础理论,不能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种种述陈之间作出缜密甄别,忽略了理论作为悟彻之主要工具的意义(见拙作《政治系统》一九五三年版)。这并不是说,当时的所有学者都对以往的研究持有非议,不过,这些责难确乎代表了政治科学的主流,它们已促进了政治科学的移易革新。就其探求政治系统的基本理论来说,《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的出版既证明了新的政治科学的存在,又促进了其绵延发展。

八十年代,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的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的所谓反文化的革命(Counter-Cultural Revolution)——当然,不能将它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混为一谈——在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及希冀、追求方面引起了诸多变迁,其时,人们接受这些变迁的速度有如这些变迁自身的实质一样,都是始料未及的。今天,我们对这些变迁业已公然知晓,因而我无须再赘述其特点。在西方,我们依然处于其影响之下。

这些变迁因其特定的内容而有所不同,亦因不同的地区国度而迥然有异,可是,它们却以某种形式对整个学术界内外产生了影响。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的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

国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鉴于世界共同体中对这些问题存在新的、仍在增长的迫切感,社会科学再度发现,亟须对这些领域予以严重而系统的关注。与其说是科学的逻辑,还不如说是种种社会问题为社会科学确定了前提。

其结果,应用性社会科学迅速开始代替早先揭示基础知识的努力。人们心中滋生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兴许仅只可以察觉,然而它却令人信服地表明:由于人类面临着核大战引发的、甚或是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生态灾难造成的全体毁灭的明显威胁,由于地球自身的存在确乎濒临绝境,因此,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要比我们过去的设想来得仓促突然。在社会科学中,甚为迫切之事似乎是运用我们累积的悟性和灵慧来释解现下的问题,而不是钻研基础知识。人们对于我们当前社会知识的可靠性极为有限这一点忧戚重重,这些忧戚必然既使寻求答案的限定时间愈加紧迫,又使与此相关的公民们对于答案的企求益发热切。

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些潜在的、通常并不公开表露的情绪,促成了政治科学中诸如政策分析这种新的支配趋势。五十年代,政治学家中公认的普遍习惯是提供有关社会变化和革新的专门咨询,当时的批评家们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我们的知识极为有限,并不能验证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否可靠适宜。而八十年代,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极大变化。政治学家公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一道,认为,如果现下社会迫切需要并期冀自己提供某些帮助,那么,即便这些帮助更多的是以所企望的可靠性为基础而不是以知识的可靠性为前提的,提供这些帮助大概也要比全然无动于衷要强些。

自从本书第一次付梓以来,政治科学中还发生了另一些重要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五十年代末,经济近乎一无阻滞地节节增长,而迄止五十年代末,随着这种战后繁荣的消逝,经济开始成为人

所关注的中心领域。美国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一系列经济萧条给表面持久繁荣的岁月投下了阴影。人们不禁回想起了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境况。基于其对于社会变化的感受,社会科学各学科迅捷开始反映这种再度兴起的对于经济的兴趣。

在政治科学中,这一点也以若干方式得到了体现。首先,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此时,人们再度承认了这一点。因此,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

其次,再度兴起的对于经济的研究兴趣部分是由政治科学引起的,为此,政治科学中的一个旧式术语“国家”(State)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在五十年代,随着行为主义的变革,作为一个概念的“国家”被认为不合乎要求,未久就为一个涵义更加丰富的术语“政治系统”所代替了。“国家”这一概念之所以会被政治学首先摒弃,是因为它早先是含糊不清的。虽然现今照我看来,它丝毫不明晰可鉴,但它却又成了分析的术语。其原因,我在《国家重围之下的政治系统》^①一文中已作了剖析。除此之外,这一概念复苏的原因,一定程度上还确实在于我所说的美国社会科学受到的第三次马克思主义的冲击。第一次冲击自然是在马克思在世期间,第二次冲击则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那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渗入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中。今天,在其第三次冲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尼科斯·普兰札斯(Nicos Poulantzas)的著作中所阐述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当前社会科学的方向和某些理论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新生的马克思主义

① 《政治理论》一九八五年第九期第 303-325 页。

使“国家”这一概念得到了复苏。现在,人们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国家”作为分析的核心定向范畴予以采纳和适应,甚至那些对于同马克思主义相近的一切思想都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亦复如此。这一术语与迄今仍然普遍使用的“政治系统”概念比肩而立,两者之间的关系尴尬局促,而且常常得不到说明。

第三,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理性的人和公众选择模式。这一方法是从经济学中移植来的。首先设想由假定的理性行为者作出种种选择,再根据这种设想,建立政治行为的若干模式。经济学的这种技术性创造,起初为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了诸如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论述正义问题的著作的初始推动下,这种方法使政治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与历史的和分析的研究相分离,使政治哲学家以往那样关切研究正义和更高的道德性等实质性问题。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已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

当然,对于政治研究来说,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什么新人娇客。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十九世纪就曾对此作过大量论述,前面我也已提及,三十年代它在美国曾风靡一时。此外,即使行为主义在其他地方盛行时,它在欧洲也从未真正寂灭过。不过,这时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凡响之处,并不在于它要重新努力揭示国内外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照早先的政治经济学看来,这一点是这种学说研究的核心,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所有的美国人(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人)都不认为这一点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惟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

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移易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也确实因为如此,许多经济学家才主张实行这种“大帝国主义”。

热衷于这一模式的历史性初次狂潮现在正开始消退。经由政治研究的各个领域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此模式的多次试验,人们正在作出早已料及的批评性反应。尽管如此,在八十年代中期,理性模式一开始所具有的魅力要素尚不会消耗殆尽。

论及《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首次问世以来政治科学研究方向和方法上的所有这些变化,我又回到了开始这番议论之初所提出的问题上:随着本书被译成中文,今天,系统分析的位置何在呢?

首先,系统分析现在仍然是研究一般理论的唯一通览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竞争对手。我之所以要谓之曰“不幸”,是因为众所周知,只有某种理论方法不断为其他理论方法所替代,科学方能够获致进步。以理性的设想为基础的模式并不是系统分析的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并没有声称将适用于政治研究的一切重要领域。

一方面,因为这些模式具有简化主义的特性,所以它们恐难适用于政治研究的一切重要领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些模式用作分析单独的行为或分析被看作一个个独立单位的团体行动者,是适宜的。而且事实证明,当这些单独行为处于竞争状况而不是合作状况时,这些模式更加有用。它们既不能被成功地运用于政治研究各重要的规定领域、亦不能圆满地研究那些可能限制、而且有时甚至支配单

独行为的结构性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理性建模的范围必然要受其简化主义特性的限制。总之,如同我所指出的那样,不能想象,简化主义的理性建模是向一般政治理论迈出的一步。在广袤丰富的政治研究中,存在着许多必然的领域,即使按照这种模式最乐观的倡导者的看法,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显然也是这种模式所力难胜任的。

另一方面,系统分析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系统分析构成了其通贯整个复杂结构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若干机构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政治系统”。总之,系统分析现在仍不失为一般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

其次,虽然政治科学的大部分阵地已为政策研究所占领,虽然整个研究和教育系统中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而创造知识,可是,我一向认为,对于一些坚持追求基本悟性的人们来说,仍然存在着施展余地。在西方,我们现在仍然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即自五十年代迄今的前几代人所积累的重要知识,还在为我们所运用。虽然在过去的岁月中,政治学学科的大多数研究都可以标榜为基础性研究,然而,今天这种研究的数量却是大大减少了。因此,一些研究者罔闻从事基础性研究的这种努力会怎样运道兴消,依然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就确实是重要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系统分析作为一个一般理论方法继续得到发展,表明人们在尽可能不断地努力促进我们的基本悟性的重要积累。

第三,系统分析的目标和取向与应用性研究的选择并无很大抵触。譬如,政策分析得以在政治科学中确立之前很久,系统分析就提供了政策输出、结果及政治性反馈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莫不诞生了今天政策研究的特点。只要任意检视一下政治学文献的递嬗演进,自会发现这一点。

此外,新的政治经济学与系统分析方法亦非冰雪火炭。后者明确提供了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进一步认为,人们不仅应该虑及经济系统,而且应该计及其他重要的社会系统。换言之,如果我不揣冒昧的话,那么可以认为,过分专注于研究任何单独的一系列社会变量——比如经济变量,其所得到的看法并不如系统分析所具有的眼光周全成熟。系统分析并不臆断政治系统的环境中有什么单独的系统(如经济系统)是具有首要的支配性,还是如同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最终的决定性。系统分析认为现代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正确的眼光和衡度方法,惟有一般理论方法才会有承认这一点的逻辑动机。由此使我们想到,比如,早先我们曾锻造了联系心理学和人类学的链条,其结果,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称谓的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人类学等边缘学科。而且系统分析在其概念化的过程中,备下了与其他社会的、生物的及生态的系统的联系纽带,生物政治学即是一例。有些东西流行一时,而且也未必有什么错误缺失之处,譬如政治经济学即是如此。可是,我们不应认为这些东西就是确定科学总体发展中什么是最终唯一必要的标尺。

进而言之,在八十年代,人们以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名义,如此强烈地吁求“使国家回到”政治分析中来^① 而对于系统分析来说,这种吁求几乎不是什么新鲜货色。系统分析概念化伊始,所谓“国家”便担任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鉴于系统整局设计的着眼点,国家未曾成为这样一种中心范畴,而是被分成了其几个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即是“政治当局”。举凡熟谙系统分析的人都知道“政治当局”这一概念是

① 见 P. B. 埃文斯(P. B. Evans)、D. 鲁谢迈耶(D. Rueschemeyer)及 T. 斯科施波(T. Skocpol)所著《使国家回归》一书,尤见第一章,纽约坎布里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何等的重要,其原因特别在于:为政治系统制造并实施政治输出、充任政治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中介行为者的,正是政治当局。由于“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模糊难辨,因而,它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是含混不清的。可是,如果它不把“政治当局”作为核心要素包含在内,那倒也是对于这一术语别出心裁的用法了。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人们尚未喧嚣着要求使“国家”回归时,它就已经是政治分析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了。而且依我们看来,这种喧嚣是多余的,因而是不必要的。当然,社会学领域中的许多人都忽略了“国家”或政治当局的独立影响。人们大多把它们视作若干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而并不认为它们自身即是政治的及其他各种政治性影响之渊藪,社会学的这些缺陷看来是严重的,然而,我们不应将这些缺陷泛泛地误认为是政治科学的特性,亦不应将其特定地误解为是系统分析观点的专利。

由此可见,很显然,系统分析是以最广泛、最一般的方式构成的,是故虽然近几十年内方法研究的方向已发生了变化,可是,系统分析对于当前政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仍具发言权。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有如此多的由系统分析所提出的概念,都已被用来解决现下所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了。

至此,尚有一个问题还未曾论及。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一贯称之为探究基本或基础知识的事业之核心。系统分析矢志于科学方法研究,真正提及科学,我们就必须直接关注当前流行于西方学术氛围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而本书的中文译本正是在这一氛围下问世的。

在西方,近十年来科学方法本身遭到了抨击。有些人想把文明的当前状况尽皆诿过于科学方法及与这种科学方法相关的种种态度,并出于这一目的,把科学方法说成是实证主义的。这些批评家们的聒噪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十七世纪笛卡尔就开始意识到了科学的本质,而

这些批评家们只不过是笛卡尔那儿作了些篡改而已。由于尽人皆知的对于科学方法的不满情绪，纷攘的时节才给这些批评家们提供了再次可资利用的论争机会。

不过，今天的不同以往之处是在于，那些亲身运用科学方法的人们已认识到，他们对于自己一直运用着的科学方法的看法是过于狭窄拘谨了。它已造成了一种枯燥死板的状况，这种状况将会使科学的想象力枯萎泯灭。由于探讨理论的想法逐步减少，由于科学研究谋求新见识的本性日趋退化，科学方法已降格到只具有技术性效用了。这种看法拒绝承认隐匿于科学背后的诸多伦理目的实在是其一个组成部分。

那些谙知本书中或其他地方我的著述的人们都知道，我从未认为自己是个严格的实证主义者，我历来把这一大号用来描述那种对于科学的取向，而它现在已成了批评家们的主要矢石之的。我一直蜚首于理论工作，如果说这一工作还想揭示某些未为人知的发现的话，那么，它必定不可能与这一领域中尽人皆知的东西有过于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所以起步伊始，我所纳取的科学事业概念，就比实证主义者对于科学的阐释中有关科学事业的特定概念要活泛得多。所幸我窃自保留的这些想法欣然吻合于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们研究公认成功的科学家们的所作所为而得到的新近发现。

在这儿，我无须就此作细琐的纠缠。在拙文《美国的政治科学：过去和现在》中，我已对此作了论述。^① 我需要反复申述的只是：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不可把科学方法全然等同于早先的实证主义者的不证自明的数学方法。科学方法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正规微积分学是一道

① 此文已在中国翻译刊出；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的《国际政治科学评论》亦再次予以登载，见该期第133—152页。

程序,它恰恰反映了诸如研究力学的这样一些物理学家可以借以处置课题的方法,因为他们所研究的课题具有特定的性质。^①自二十世纪以来迄前不久,实证主义的始祖维纳·西尔克尔(Vienna Circle)对于科学之本质所作的释义一直踞有统治地位,他断言,所有的科学都可以以其狭隘而正统的种种概念囊括之。时至今日,人皆承认这种结论是专断而失当的。

今天,根据对于那些公认成功的科学实践者所实际走过的研究道路的切实探溯,我们已经对于过去的伟大发明背后所隐匿着形形色色的程序获得了更为精确的了解。比如,我们已经知晓,事实并非守谨的实证主义者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所有的术语都一定是运算性的;也并非所有的悟性必然要以概括或通则的形式加以凝就。实际上,非经验的分析术语和范畴,诸如概念框架、概念分类、特种(ad hoc)分类设计、定性命题及概括等均具科学特性,就此无须作特殊的辩白。尽管依实证主义者对于科学所作的狭隘阐释来看,它们不属于科学之列,可是,它们却是公认的科学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经年累世的储积。决没有任何成功的科学实践者会自省自责:理解一种现象是否会需要两种明显不一的理论,虽然这种矛盾状况未曾被尝试过,可它不可能总可以避免。如此等等。

在若干同类著作中,H. R. 汉森(H. R. Hanson),H. 帕特南(H. Putnam),D. 夏皮尔(D. Shapere),F. 萨普(F. Suppe)及S. 图尔明(S. Toulmin)的著作充分论述了新的科学哲学,这一科学哲学已开始使整个科学事业具有了弹性和丰富的内容,并且使它摆脱了不切实际的逻辑而步入了研究的实际领域。在西方,我们已经屡屡耳闻:科学方法并没有失灵;寂灭的只是正统的实证主义者对它的看法。科学哲学与

① 参见海因里希·赫茨(Heinrich Hertz)于世纪之交所撰写的《力学理论》一书。

其他学科几无二致。它对于自己所研究的课题的理解是不断成熟和变化的。在这过程中,它会对于科学方法的本质得到新颖的、不同故往的、而且如果一帆风顺的话,那就是更为精确的悟彻。

在此方兴未艾的科学方法的本质再次概念化的过程中,那些力图增加我们的基础知识、力图使科学保有逻辑和方法论的精确性的人们,有着更大的施展余地。那些武断且常常愚昧地强调规律的技术性用语的人们,不惜一切代价使术语运算化,并且不管那种种假说是何等令人乏味,也要明确地对之展开研究和验证。他们常常谤斥为“前科学”的东西,现在实际上却成了基础知识事业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缺乏想象力的实证主义甚至迄今还在过多地影响着许多科技专家治国论者,而洞察力与这种实证主义悖然相异,它与准确的数据记录及其精确的分析一样,都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历史业已证明,科学的区域和范围的界定、概念框架的设计,对于一门学科来说,犹如真正正式确定的定理一样,是至关重要的。确实,要是没有前者,这门学科的继进发展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系统分析理所当然是继承了科学的传统,然而,不言而喻,它是按照有关科学本质的更为新颖的、人们希望更加可靠的诠释来承袭这一传统的。

有幸与我的中国社会科学同仁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对话“宛若我们在西方进行讨论一样”,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异乎寻常的学术活动之先兆。我绝少怀疑,倘若今后几年有机会,重大的知识创新和发现将会在中国诞生,并且使其存在为国际学术界所周知。如果中国同仁对于本书中的思想所展开的讨论能够对这种知识的酝酿略有裨益,那我委实会感到荣幸欣慰之至。